



世界通史
当代史

(三)

张立虎摇主编

目 录

第十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形势·····	1
一、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国内背景·····	1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10
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巩固·····	18
四、新中国的外交·····	22
第十六章 亚洲的民主共和国和解放斗争·····	23
一、越南民主共和国·····	23
二、南北朝鲜·····	24
第十七章 20世纪 70年代苏联的建设与政治局势·····	25
一、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25
二、斯大林逝世前后·····	26
三、赫鲁晓夫执政·····	28
四、70年代的苏联外交·····	28



第十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形势

一、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国内背景

遽新中国面临的复杂形势

中国人民革命获得重大胜利是当时形势的主流，同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在许多方面都还很不完善，面临着严峻考验。

在经济方面，新中国是在愚昧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成立的，经济萧条，生产落后，民不聊生，市场瘫痪。尤其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货币，导致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投机猖獗的不利局面。

在军事方面，中国人民革命基本上取得胜利，但还有一些残余敌对势力没有消灭。华南、西南和沿海岛屿还有上百万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在解放区，国民党在溃逃时还剩下大批残余力量，他们同当地恶霸势力相串通，用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来反对人民政权。

在国际方面，新中国的成立，只得到苏联和欧亚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缅甸、印度、瑞士、瑞典等国经过谈判后，决定同国民党政府停止外交关系而和新中国建交。英国很早承认新中国，但它在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和支持新中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建交谈判只能推后。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后，仍然与中国人民为敌，妄想政治上孤立新中



国，在经济上封锁新中国，在军事上包围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不能在同帝国主义的较量中取得胜利，这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队伍，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党能不能继续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自我批评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不被腐蚀，这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来的，也是人民所十分关心的。

面对建国初期的种种问题和考验，中国共产党保持冷静的头脑，为巩固人民政权进行了艰难的斗争。

消灭国民党残存兵力的战争，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继续向西南、华南方向作战，相继取得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阳）宝（庆）战役、广西战役的胜利，并在贵阳战役、成都战役和重庆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和宋希濂集团。1950年10月在渡海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也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又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了云南、四川、西康等许多地区。经过八个月的作战，到1950年12月为止，共歼灭140万国民党正规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歼灭国民党军队达到150万人，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以外，基本上解放了全部中国领土。在中共中央的努力下，于1951年5月，终于成功地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同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从此解放了。在有些地区，人民解放军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到1950年12月，歼灭国民党土匪武装人员近百万人，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在人民解放军席卷中国大陆的军事胜利的大好形势下，



在各新解放区，首先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还成功地召集各界人民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其中领导人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也包括各阶层的许多爱国民主人士。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行使权力的政权。

新解放城市军管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没收官僚资本。在总结华北和东北解放战争中接管城市的经验教训后，军管会决定对官僚资本企业的方法不能和对待国民党政权机关一样，即不是彻底推翻它们的机构，而是先根据原来生产系统和组织机构，“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由军管会完整地把它管下来，实行监督生产，并逐步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除此之外，人民政府还逐步废除了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中国境内的经济特权，并收回长期在帝国主义盘踞下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外汇的统一管理，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而且也维护了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利益。

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在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的情况下，怎样使人民群众中反对我们的人变得拥护我们，同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打击和孤立当时的主要敌人，更快地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稳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这是当时党和人民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50年9月20日到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此次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还为这个报告作了说明，即《不要四面出击》，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中央一些部门领导干部也发了言，毛泽东作了最后总结。这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确定了中共中央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政策和行动纲领。

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中分析了新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经过一年来的努力，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还需要继续改进。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取得根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一切工作都要以这一任务为中心。“三个条件”、“八项工作”是完成恢复经济的工作纲领。要使财政经济状况取得根本好转，大概需要三年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完成土地改革，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大量节减国家机构所需经费，在创造这些条件之前，必须肃清反革命、整党建党、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等。

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中从理论上总结了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恢复经济的策略方针。文章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作斗争，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以便打击和孤立当时的主要敌人，而不是四面出击，树立太多敌人，影响全国的稳定局面。必须在某些方面作出让步，有所缓



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支持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我们，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恢复经济的战略方针和纲领，新中国以恢复国民经济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人民政府打击市场投机，中共中央杜绝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恢复农业生产，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1950年1月至1950年12月，社会上共掀起四次物价飞涨。为制止市场混乱，严厉打击投机资本，中共中央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人民的拥护，采取强有力的经济策略和有效的行政手段，先后组织了同市场投机作斗争的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针对当时猖獗的银元投机，中共中央明文规定禁止银元、金条、外币自由流通，统一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把人民币确定为唯一合法货币。1950年12月10日，上海刚刚解放半个月，军管会出其不意地采取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投机商1000余人，严厉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然而投机商又把目标转移，改为囤积粮食、棉布、棉纱和煤炭，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于是，又进行了“米棉之战”。人民政府组织全国人民进行粮食、棉布、棉花、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运动。在1950年12月15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放开抛售，使物价在短时间内下跌。同时又收紧银根，投机商由于资金短缺，难以周转，纷纷破产。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是我们取得的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中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得到了



广大人民包括从事合法经营的资本家的一致支持。

为使物价趋于稳定，改变以前各解放区财政经济管理分散的状况，杜绝通货膨胀，彻底扭转市场混乱状态，中央政府针对当时的形势采取强有力措施，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政务院先后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等，确定了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战略。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除留若干供近期使用外，一律纳入国家银行，统一控制管理。全国各地按照中央关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指示，基本上使财政收支趋于平衡，物价也基本稳定了下来，并且提高了人民币的信誉，扭转了建国初期极其不利的经济形势，获得了新中国经济战线上的首次辉煌胜利。

经过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新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经过全国人民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战胜重重困难，终于在社会经济大改组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形势下，使国民经济基本上得到恢复。在恢复中，各项生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召开和全会后各项财政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保证我国革命能够在取得根本上胜利的形势下，逐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具有重要影响。

獾鬃运动



建国初期，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虽然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也落荒而逃，但是在国内还有大量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这些残余势力，主要是土匪、恶霸、特务、流氓地痞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决不甘心失败，还要作最后的挣扎。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当时形势的迫切要求，也是党和国家必须确定的政策。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自1950年11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先后抽调18个军10多个师，约150余万兵力投入剿匪。在剿匪斗争中，各地剿匪部队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协助下，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原则，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对国民党军队残余恶势力、特务、土匪及其他反共武装展开剿匪斗争。在军事清剿的同时，人民解放军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地方建立民主政权和革命秩序，恢复生产，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在近一年的时间内，相继在西北、西南、中南、华东等地区取得辉煌的成绩，共剿灭土匪100万人，捕获特务分子100万多人，破获国际间谍案100起，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1950年11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分驻西北五省的第一野战军开始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大规模围剿，先后剿灭了作乱川陕边的王凌云，为害临夏地区的马保、马八娃和马英贵，打家劫舍于青海省的马老五，剪径于宁夏地区的马绍武和流窜于陕北各地的股匪。

1950年12月土匪又不断进行暴动。针对匪患又起的现象，解放军西北军区各部队重新展开大规模的围剿斗争。对



甘、新、青三省进行会剿，活捉匪首乌斯满，西北地区剿匪到此已基本结束。

1950年 圆月，西南局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为平息匪患，会议决定首先剿灭腹心富庶地区的土匪，接着向边沿贫瘠山区扩展，尤其要把四川腹地的土匪歼灭掉，以保证征粮和春耕生产顺利进行。根据这次决议；西南军区对剿匪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地方党委领导部队，组织一些机动兵力，从猿月到苑月间，发动一系列围剿。

到 1950年 苑月，西南地区各省，共歼灭猿万土匪，在各省腹心地区已基本上歼灭了土匪。

1950年 员月初，在反霸、减租、退押的群众运动中，西南全区党政军民深入清匪，努力侦捕远遁漏网和化装潜伏的匪首。

中南地区根据中央关于剿匪的指示，首先在鄂、豫、皖区进行了剿匪斗争，活捉了这个地区的匪首裴小个子，另外还击毙了土匪头子罗来绪。

在湖北省，于追歼宋希濂残部的同时，清剿了鄂南崇阳八斗山等地股匪，全歼了王兴正、李慧溪匪部。

在大别山区自称第一支队司令的冯春波组织“鄂豫皖人民自卫军”，企图开辟“第二战场”，却于 员月 圆日被生擒。

在江西，把赣北、赣东北、鄱阳湖一带看作重点进剿区，水陆并进，在此地活捉了坚持反共达 圆年之久的“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黄镇中和井冈山的土匪头子肖家璧。

在广东，首先是 1950年 员月对以张大杰为首的“反共救国军”进行了围剿。猿~源月间，匪情又急剧恶化，于是



先重点用兵于封川县，镇压渔涝、杏花两地的暴乱，接着挥军进剿罗定、泗纶地区，随后又在东江剿灭了“华南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重点清剿了陆丰东北地区，在北江地区全歼大股土匪，活捉了其匪首。

华东地区的剿匪部署，首先是从解放较早的山东省开始入手。1949年 8月间，进行重点清剿，对“崂山特务大队”、“山东人民救国自卫队”、“胶东特务大队”等匪特 1000多人进行了毁灭性歼灭，使匪首张占鳌、韩度州等俯首投降，山东的匪患才得以解决。

安徽省是华东地区匪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49年 8月解放军对其展开围剿，于 9月初，将匪首汪宪生擒。

福建省山区驻闽部队，在 3个月内歼灭土匪，取得了很大胜利，消灭了应志诚、王传盛、刘子宽等打着各种旗号的草寇。

平原省党、政、军齐心协力，在军事进剿的同时，发动政治攻势，取得显著成就，共歼匪特 1000多人，登记自首者 1000多人。

1949年 8月到 9月，察哈尔全省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共歼匪 1000多人。为扫清残匪、净化社会，在匪情严重之重点县、区、村，先后实行联防、建立情报站等形式，使匪徒无藏身之地，并捉获了匪首王殿阁、何大头、赵成功。在这次围剿中，全省共歼匪 1000多人。

河北省从 1949年 8月就开始展开剿匪斗争，一年中共歼匪 1000多人。

在山西，歼灭阎锡山残部和落草为寇者 1000多人。

绥远省军区于 1949年初展开剿匪斗争，在乌审旗境内



歼匪徒 ~~四~~多人，在百灵庙、召塔、高壁、包头、萨拉齐等地区歼灭大小股匪千余人，全省各地共歼匪 ~~四~~多人。

全华北地区，共歼匪 ~~四~~多人。

经过 ~~猴~~年的剿匪斗争，共歼灭国民党有计划留于大陆的反动武装、特务以及历史上因袭下来的土匪共 ~~四~~余万人。

早在 ~~鼠~~年 ~~猴~~月，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然而在 ~~鼠~~年 ~~鼠~~月以前的大半年中，全国很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右倾思想。美蒋特务和反革命残余势力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公然地向人民发动进攻。事实证明，不轰一批“东霸天”、“西霸天”，就不能巩固人民政权，就不能使人民群众挺起腰杆来。

~~鼠~~年 ~~鼠~~月 ~~鼠~~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并要求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方针，团结人民，孤立反革命分子。~~鼠~~月 ~~鼠~~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倾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审慎研究处理，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必须注意重视证据，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和禁止肉刑。

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遵循上级指示，自 ~~鼠~~年 ~~鼠~~月开始大规模地发动组织群众，展开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各地纷纷召开各种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群众大会和公审大



会，并举办一些揭露反革命分子罪行的展览会，使群众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1957年春，出现了检举、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高潮，为使运动健康发展，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提到，要想镇压反革命必须要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党委的领导，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使公安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谨慎行事。并指出镇压反革命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的首领。1957年4月28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为镇压反革命斗争提供了法律上的武器和量刑标准。

为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巩固已取得的成绩，1957年4月28日公安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对过去7个月来的工作作了全面的总结，并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规定自即日起，镇压反革命必须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精力办理积案；坚决严惩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的损害国家利益者，并立即执行，对于那些罪行没有达到非杀不可，也没有达到危害国家利益最严重程度的该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可以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为避免运动高潮中出现“左”的偏向，从4月28日起由地委专署一级行使捕人批准权，由省一级行使杀人批准权；对隐藏在军政机关和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开始有计划地加以处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保证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到1957年5月，全国性大规模的运动已基本结束，镇压反革命转入对查出的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处理和对党政军



机关开始清查的阶段。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斗争分为重点进剿、分区驻剿和结合土改清剿散匪三个阶段。到1950年底，对那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湘西、广西土匪以及那些城市的黑社会势力进行了全歼，共歼灭匪徒100余万人，自此中国大陆的匪患基本平息。通过这场剿匪运动，肃清了三大敌人在我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我国社会秩序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

镇压反革命的成功，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企图颠覆新中国的阴谋，使全国各级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成立了无数的群众治安保卫委员会，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镇反剿匪运动的胜利，使抗美援朝战争有了坚强的实力做为后盾，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土地改革运动。

镇压反革命，剿除匪患，使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威信得到了提高，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权威地位，有利于进一步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

镇反剿匪的胜利，使我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为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①国民经济的恢复

经过八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以及历时三年多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战争，中国原本落后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



坏。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1952年的工业总产值已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 30%，轻工业减少 15%，钢产量减少 15%，煤减少 10%。在工农业总产值中，1952年现代工业总产值只占 15%。据统计，195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 40 美元，不到整个亚洲平均值 50 美元的 80%，不足印度 50 美元的 80%。这种情况使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显得十分紧迫。

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我们的工作重点不能不向经济建设转移，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支持战争和国防建设。抗美援朝战争对经济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美国政府悍然宣布对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进行管制，禁止美国货物和船只进入中国，还控制巴黎统筹委员会，使其对新中国实行国际性的、全面的封锁禁运。封锁禁运虽然给中国的经济造成很多困难，但中国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屈服，这反而激励中国人民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努力奋斗。

“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实行土改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土改集中在冬春农闲时进行，目的是不误生产。土改仍然继承了小农经济的个体性质，在摆脱了封建枷锁后，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党认为不仅要发挥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且要在自愿和互利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个体农民之间的劳动互助。国家还从减轻赋税、发放农贷、疏导供销、推广技术、奖励生产，尤其是动员群众兴修水利方面，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做出努力。在财政仍很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水利建设。三年内，全国有 4000 万人直接参加了水利建设，完成约 100 亿立方米的工程，相当于 100 亿



条苏伊士运河，这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利建设。同时著名的根治淮河工程、官厅水库工程、荆江分洪工程也都开始动工。

中央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也特别重视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的恢复。到1954年，基本修复了全国原有的铁路网，中断铁路交通十几年的华北和华南连接了起来。成渝铁路从1952年12月开始修建，1957年10月1日基本竣工，通往世界屋脊拉萨的康藏公路、青藏公路也是这时开始兴建的。

为了恢复并发展工业，党提出两条政策，一是要主要依靠工人阶级，二是不能脱离国营经济。工人在成为国家的主人之后，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劳动模范不断涌现，并开展了广泛的劳动竞赛。在重点建设方面，除首先对东北等地原有的企业进行恢复和改造外，还兴建了阜新海州露天煤矿，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山西重型机械厂，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的棉纺厂，哈尔滨亚麻厂等一大批骨干企业，并由中国自己制造了成渝铁路所用的钢轨，治淮工程中的整套钢铁闸门。

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对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党认为，要逐步发展壮大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使之成为流通领域的主渠道，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从上到下的包括各种门类的统一的国营商业体系。1954年底国营商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15.3%增加到19.5%。作为国营商业联系群众特别是联系农民的重要助手的合作社商业，全年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18.5%。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对私营工商业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一直都是党极其重视的问题。为了限制其负面作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扶持的方针。政府采取扩大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以提高农村购买力、适当收缩国营商业、调整税收负担、教育私营企业工人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等措施，使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得到了合理的调整，并于 1952 年秋基本上完成了调整工作。

经过调整，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1952 年下半年，市场情况开始好转，1953 年以后，市场更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在调整过程中，国营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其领导地位也得到了巩固。

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国家财政收支逐步平衡，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相应发展，职工、农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

随着经济的恢复，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国家的支持下，国营经济发展最为迅速，极大地发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 1952 年的 33% 增加到 1953 年的 41.5%，另一方面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由 1952 年的 30% 上升为 1953 年的 35.5%，现代工业产值也增加了 25%。

②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村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亿万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即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